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双林
编

章士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双林
编

章士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士钊卷/郭双林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461-1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章士钊 (1881~1973)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35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士钊卷

郭双林 编

Zhang Shizha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43.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02 000	定 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言

(一)

章士钊，字行严，一生笔名甚多，有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支那汉族黄中黄、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章邱生、青桐、烂柯山人、民质、秋桐、孤桐、无卯、韩民青、初到欧洲者等。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自幼随长兄士瑛受教，14岁时偶然在长沙买到一部永州刻《柳宗元文集》，从此喜欢上柳文。以后他凭借这“鸟柳文”（吴稚晖语）操笔论政，卷起一股股论潮。直到晚年还写出了洋洋数百万言的《柳文指要》。

17岁那年，受生计所迫，章士钊不得已中断学业，干起了“为童子师”的塾师职业，以所得束脩补贴家用。1901年到长沙东乡和佳冲老屋读书。当时老屋前庭有两株桐树，东隅老桐叶重影浓，苍然气古；西隅少桐皮青干直，生机勃勃。读书空闲，他经常到庭院走动，这两株桐树便成相伴之物。时间一久，他发现桐树有许多长处，而最明显的莫过于那不屈不阿的直德。他尤其钟爱那株皮青干直的少桐，于是便自号“青桐子”，隐然以少桐自命。^①以后他曾使用“青桐”、“秋桐”、“孤桐”等笔名，早年的经历在其生命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沉的烙印。在此期间，由于用功甚苦，竟至得了咯血症。后在大姊的劝说和资助下，离家远游，从此离开故土，登上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① 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第5页。

(二)

1901年秋天，章士钊携四弟来到湖北省城武昌，报考湖北自强学堂。因误了考期，未能入学。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得到同乡、旧时同学王闿宪的帮助，到两湖书院同斋共读。在此，他首次遇到了黄兴。1902年，章士钊顺江东下，到南京报考江南陆师学堂。在考试中，他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为题作文，伤时切弊，辞趣妙敏，博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一举中的。

1903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在此之前，尽管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但爱国救亡一直是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由知识界领导的爱国运动此伏彼起；在此之后，由于上述爱国运动无不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破坏，爱国潮流迅速被共和革命的浪潮所取代。

此时弥漫于东京、上海的革命热潮已经波及了南京。作为江南陆师学堂“学魁”的章士钊，主张“废学救国”，并与林力山等30余名学生毅然退学，奔赴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①。在此，章士钊结识了章太炎，并受到器重。同年4月，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和陈独秀因惩罚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而被迫秘密回国。陈独秀返回家乡安徽，邹容和张继则留在了上海中国教育会。章太炎在日本时就与张继相识，此时又和章士钊及邹容相识。四人虽然年龄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志向、爱好，使他们很快便成为至友。

上海地区风潮的涌动，使许多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并最终酿成了“苏报案”。

《苏报》创刊于1896年，原由胡璋（铁梅）主持，聘当时沪上著名文人邹弢为主笔，但胡璋推其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由于该报内容平淡，亏折过多，被迫转售。1900年，湖南退职官僚陈范将其接办过来。在其主持下，该报很快便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

1903年5月，陈范聘请年仅23岁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并聘请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分任撰述。章士钊对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

^①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的改革，并刊发了大量鼓吹革命排满的文章。在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中，他利用清朝政府内部的矛盾，通过具体事实说明，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官逼民反，是在制造革命党。在《驳〈革命驳议〉》一文中，他批驳了汪康年在《中外日报》发表的《革命驳议》一文，强调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任何人都不能阻挡这一历史潮流。

《苏报》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论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忌恨。6月25日，到达上海的江南陆师学堂前总办俞明震，当着吴稚晖的面委婉劝说《苏报》改变态度，并出示捕人命令，暗示有关人员躲避。不料，苏报馆竟不买这个账。26日，该报刊出论说，点名谴责俞明震。27、28日，《苏报》又刊出论说《论仇满生》，宣布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缓。29日，该报又摘选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一段，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标题刊出，矛头直刺光绪皇帝。至此，苏报案已是在劫难逃。苏报案结案后，章士钊编写了《苏报案纪事》（又名《癸卯大狱记》）一书，逐日记载了苏报案发生的经过。

1903年6月初，留日学生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派往湖南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苏报案后，章士钊放下笔杆子，和黄兴一起到处奔波，筹集款项，二人于11月4日在长沙和刘揆一等共同发起成立华兴会。

1903年8月，章士钊与谢晓石、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继承《苏报》宣传排满革命的传统，先后刊登了大量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因此，“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①。在该报上，章士钊先后发表了《箴奴隶》、《说君》等文章。在《箴奴隶》一文中，他将奴隶置于与国民对立的地位，并将奴隶分为“钝根奴隶”和“利根奴隶”、“形式之奴隶”和“理想之奴隶”数种。在他看来，在当时四万万国人中，其“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②。他还考察了中国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奴隶而无国民的原因。在《说君》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君’也者，成立于野蛮时代，发达于半开化时代，而消灭

^① 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报》，《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23～24页，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

于极文明时代。”^① 文章考察了君主的由来及为君的方法，分析了君主制带来的祸患。可惜文章仅刊登不到一半，即因篇幅太长，不合报刊“社说”体例而中止。

此外，章士钊还创办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先后出版《黄帝魂》、《孙逸仙》、《沈荇》、《攘书》、《保国歌》、《国民日日报汇编》等宣传反满革命书籍。其中《孙逸仙》一书译自日本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原书本来是作者前半生的自传，经过节译，竟成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史。在为该书撰写的自序中，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著录此书，标之曰“孙逸仙”，并不是为了给孙中山个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②。该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③。

1904年10月黄兴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后，在黄吉亭牧师的帮助下逃回上海。章士钊则先后租赁四处招待所，供办报和革命党人使用。此前，黄兴曾在湖南设立同仇会，以联络洪帮弟兄，后又别树爱国协会于上海，招邀内层志士，推杨笃生主持，而以章士钊为副会长。当时议论的所谓革命计划，以暴动为主，而辅以暗杀。不久，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因章士钊一时疏忽，导致众多革命党人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纷纷逃避，章士钊亦逃往日本东京，“上海之局，暂告结束”^④。

(三)

来到东京后，章士钊结识了湘籍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和职业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上海事件的刺激。上海之狱，给章士

^① 《说君》，《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26页。

^② 黄中黄（章士钊）译：《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③ 章士钊：《疏〈黄帝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1页。

钊很大的刺激。在他看来，因为自己“才短力脆，轻妄致敌”，才连累同志被捕，于心不安；二是亡命日本后，看到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深感革命党人“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他决定“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①。之后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②。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孙中山工作。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但章士钊对此却无动于衷。孙、黄曾劝其加入，结果被婉言谢绝。在他看来：“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因此他向孙、黄建议，将革命党人分为两部分，“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③。这当然不可能得到孙、黄二人的赞同，因同盟会初建，革命力量本来就比较弱小，力量一分，势必会对革命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章士钊坚持本议，双方辩论，久而不决。孙、黄二人劝说失败后，又托与其“风义最笃”、且同住新宿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孙毓筠劝说，仍遭拒绝。章、孙二人见劝说无效，便采取强制措施，将其诱至一室，禁闭起来，规定，如果不在盟约上署名，便不得出庐室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④。不料章士钊不改初衷。章太炎派同盟会女会员、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弱男前往劝说，不料劝说未果，吴反成了章之未婚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见事成僵局，只得表示体谅章之“本怀”，并向其他革命党人保证章士钊绝对“忠纯不二”，同意“听凭自择”，于是“众亦释然”^⑤。

章士钊退出革命后，努力补习英语和数学等课程，准备赴英国留学。在此期间，他利用为实践女学湖南籍留日女生讲授国文的机会，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基础，结合“西文规律”，于1907年编成《初等国文典》（后改名《中等国文典》）一书，由东京多文社出版，上海普及书局发行。该书虽然只讨论了词法部分，但因为它不仅继承发展了

①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

②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2日），第7页。

③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

④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2日），第7页。

⑤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

《马氏文通》的文法体系，而且语言晓畅，清浅宜人，成为继《马氏文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文法著作。到1930年，该书已先后印行16次，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1907年夏，章士钊由东京经上海赴英国，进入阿伯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同时兼攻逻辑。1909年《帝国日报》在北京创刊后，章士钊在求学的同时，以秋桐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政治理论，鼓吹政党政治，指导国内的立宪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何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国会万能说》、《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及“政党政治六论”（包括《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政党政治论之一》、《何谓政党——政党政治论之二》、《何谓内阁——政党政治论之三》、《何谓政党内阁——政党政治论之四》、《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之别——政党政治论之五》、《政党内阁果优于非政党内阁乎——政党政治论之六》）。在以上诸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宪政精神即在“自征其税”四字，故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英国的国会包括君主和上下院三大种族，“舍一则不成为巴力门”^①，而其权力，乃至无限。对中国当时究竟是否适合政党政治，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回答。这些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宋教仁民国初年热衷议会政治，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苏格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章士钊，虽离毕业不到一个学期，仍应路过英国的孙中山的邀请，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回国，拟出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待章士钊回到南京，胡汉民已经就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正缺人手，章表示愿做主笔，负责该报的于右任大喜过望，遂正式邀其加盟民立报社。

1912年2月11日，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章行严启事》。这则启事的刊登，标志着章士钊正式入主《民立报》，这也是他与同盟会的最后一次合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在《民立报》上发表《论反对清帝逊位条件事》、《共和略说》、《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政党与党纲》、《国体与政体之别》、《论平民政治》、《〈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统一联邦两主义之真诠》、《一院制之主张》、《中央集权之真诠》、《毁党造

^① 秋桐：《国会万能说》，《帝国日报》1911年1月18、19、20号。

党说》等一系列文章。就其要点而言，主要包括：（一）反对极端共和主义，主张建立平民国家，贵族（精英）政府。（二）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三）主张一院制，反对两院制。（四）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说。（五）捍卫《临时约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其中所谓的“毁党造党”，实即依照英国两党制改造当时中国扰攘的多党政治。当时宋教仁等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即与此一主张有莫大关系。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政论文章冰清玉润，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一时与汪精卫齐名。有人甚至戏言，“欲锢二人于高山，使操言论权”^①。

由于章士钊始终坚持英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理念上与同盟会发生原则分歧，因而不断遭到来自革命党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遂于1912年8月离开《民立报》，和王无生共同创办了《独立周报》，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清末章士钊在《帝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皆用秋桐的笔名，加入《民立报》后，所发文章，皆用行严本名。此次和同盟会发生分歧后，一些人说其这样做是故意隐瞒前情，若有隐图。所以章士钊在《独立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率用秋桐前名，以示无畏。

查章士钊在《独立周报》期间，除发表发刊辞及《章行严与杨怀中书》外，共发表其他各类文章26篇。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见商榷会；（二）内阁制与总统制；（三）对主权问题的讨论和对《约法》的批评；（四）制宪问题。此外，他还就国税与地方税的划分办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章士钊在《独立周报》发表的文章，钱基博曾说：“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不啻英伦之艾狄生焉。”^②据李大钊说，他从此时便开始追慕章士钊。但章士钊对自己这一时期文章的评价却不怎么高，说：“吾勤勤执笔，仍旧贯，然光气一落千丈矣。”^③章士钊的文章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光气一落万丈”，除了其兴趣逐渐转移外，还和他在当时所持的观点有关。后来得知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章士钊便“意兴索然”，文章的数量也日益少起来。

^① 行严：《农治述意》，《新闻报》1924年1月11日。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③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3页。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临行之前，曾邀章士钊同行，结果被婉言谢绝。实际上当时章士钊四面受攻，“困群疑罪谤之中”，也不想久留上海，“愿北首燕路，一看形势”^①；同时，袁世凯得知章士钊主张修宪，也曾通过孙毓筠招其入京。只是因为与同盟会的关系闹得太僵，不愿给黄兴增添麻烦，章士钊才故意不与同行。

1912年冬，章士钊将《独立周报》的事务略事安排后，只身北上。在此之前，即191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未经章士钊同意即宣布任命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年刚满32虚岁的章士钊自问不足担当此职，来到北京后，专门向范源廉面辞。范源廉不同意，并扶病上门敦劝，章士钊坚辞不就。事悬数月，据说还是袁世凯帮助说情，章士钊才得以于该年12月“解职”。在旧识杨度的多次劝说下，章士钊被迫偕杨往谒袁世凯。章夫人吴弱男系晚清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孙女，而吴长庆不仅与袁凯的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还是袁世凯的旧时幕主，是其腾达前的接纳者、发现者、提携者。在得知章士钊的身份后，袁世凯甚是高兴，对章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并对章“礼意稠叠，一惟士钊之意，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馆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所责于士钊者，亦宪法为之主持而已”^②。既然章士钊被袁世凯视为亲信，因此也就“与袁迹日近，稍稍预袁秘事”。时在上海的吴弱男闻讯，便致函章士钊，说：“男子立名当自致，依妻党进，非夫也。”“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促其南下。袁世凯为留住章士钊，亲自致函吴弱男，召吴进京，并腾出其在锡拉胡同的旧宅，让章居住。章士钊已经同意，并南下与吴弱男面商，竟遭到吴弱男的拒绝。吴弱男还致函袁世凯，“谓四伯（四伯是袁在家时通家往来之旧称——编者注）宜爱人以德”^③，此事遂不了了之。

在京期间，章士钊亲眼目睹了“士不悦学，乘机逐利，视政治为儿戏，从淫赌为生涯”的社会腐败现象，并写下了《箴北京》一文。不久，宋教仁案发，袁世凯贼喊捉贼，竟诬称黄兴为凶手。与宋、黄二人交情甚厚的章士钊当然不会相信，他对袁世凯的这种流氓行为极为愤

①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3页。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09页。

③ 《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17号（1925年11月7日），第20页。